



抗战相持阶段 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

赵 诺

内容提要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华北中共根据地内外形势均发生重大转变,根据地干部面临严峻考验。此艰难时势给干部群体之进退产生重要影响,造成严重的干部损失问题。尽管地方党组织提拔补充一批基层干部,但政策性束缚使干部群体获得持续晋升的机会相当有限,这就产生出干部进退升降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忠诚度与能力的平衡问题、干部成分问题、人际网络问题等因素,均对此时期华北根据地干部群体的进退升降形成重要影响,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根据地干部队伍的群体面貌和内部结构。

关键词 抗战相持阶段 中共 华北根据地 干部 进退升降

中共革命堪称壮阔浩荡,投身其间之革命者数量巨大,故产生相当数量的中共干部。对于这些干部的革命履迹、人生沉浮,既往已有各种各样的研究著述予以关注。^① 但这些成果,或以概述形式谈及政治运动、重大事件前后的干部升降问题并加以对照,虽可检视特殊节点或动因对干部政治生涯之影响,却容易忽略更复杂之历史背景;或倾向于对个别人物的革命经历展开传记化阐述,具体、生动而缺乏横向参照。因故,我们至今对中共干部中,哪些人脱颖而出?哪些人四平八稳?哪些人波折沉降?哪些人脱队匿迹?均不甚了了。

此处,笔者希望以抗战相持阶段华北根据地干部为考察对象,利用各种已刊、未刊史料,结合个体记述与群体描摹,对他们的进退升降问题做一梳理。诚然,政治生命的因缘际遇常常诡谲多变、

^① 涉及相关论题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著述主要有:Doak A.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Yung-fa Chen(陈永发),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 – 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Bo Zhiyue(薄智跃),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2); 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何友良:《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之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4—411页;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徐进:《政治风向与基层制度:“老区”村干部贪污问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谢敏:《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何志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新区的干部培养及其群体发展趋向——以川北区为考察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等。

捉摸不定,本文立足点仍在史实重建,非着意于全面判定中共提拔、降黜干部的标准。但前述遭际不同的各类干部群体有何特质?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有辙辙、通则可循?仍是值得我们追索的。

一、形势转变与干部进退一般情形

七七事变后,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在华北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和山东等稳固根据地。^①使得中共“成为华北地区最大党,八路军也成为华北最大的军队”。^②一日千里之大形势下,中共干部队伍也迅速扩容。各根据地虽初创时间略有早晚之别,但在经历组织大发展时期机构设置时常更迭、人员升降频繁改易后,到1939、1940年间都大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干部队伍。晋冀豫区党委在1939年底即认为:“经过两年,干部队伍建设,生产出一代干部。”^③晋绥根据地领导人张稼夫也在晋绥分局历史问题座谈会上谈道:“至1940年前,晋西北干部队伍算基本造成。”^④冀鲁豫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人事较晚才实现统合,但1940年春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后,干部队伍也大致稳定下来。^⑤

开局于敌后落地生根自然艰难,但由于国民党军政力量溃退南撤、日军主力南进只在华北占据个别要冲,此广阔区域虽局势纷乱却大体呈现真空状态,根据地干部在1939年之前并未遭遇严峻考验。尽管对根据地工作未尽满意,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也乐观估计:“今后抗敌的条件会越来越好,敌人困难大增,我们部队的伤亡是大,但部队大量增加,统战会更加巩固。”^⑥岂料,自1939年之后,根据地的形势逐渐发生较大转变。

在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战逐步转入相持阶段,日军暂停正面战场大规模攻势作战,国民政府在进行几次惨烈会战后也无力展开反击。而日军渐渐意识到中共力量对占领区域的威胁,在华北的兵力由11个师团增至20个半师团,在1939年到1940年,开展三阶段“肃正作战”。^⑦这无疑令华北敌后各根据地在军事上面临空前挑战,各根据地均遭受严重损失,如晋察冀冀中区10多个县沦于敌手,而八路军方面未能像之前那样迅速予以恢复。^⑧1939年到1940年日军攻势还只是集中指向平原地区以保障交通线、镇服抗日力量为目标的局部行动,那么到百团大战给日军带来极大震动后的“大扫荡”,变为整个日本华北方面军花大力气筹划的、动用重兵集团的一致行动,对中共华北根据地形成巨大军事压力,给根据地军民造成巨大损失。而且,日军随后又发动综合军事、政治、经济等内容的“治安强化运动”,给华北中共根据地形成长期、全面、严酷的压制。

同一时期,华北地区之国共力量在经历“第一次反共高潮”“晋西事变”等事件后隔阂已深。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一度使国共双方在总体上呈现剑拔弩张的对抗态势。统一战线几近全面破裂的大环境自然也会影响到华北地区,太行根据地领导人李雪峰即认为当时已到了“全面内战与

^① 中共初入华北之总体发展历程,参见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② 《晋冀豫区委会议记录》(1938年8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以下简称“晋档”),A01-01-036-002。

^③ 李雪峰:《两年来晋冀豫区委底领导总结》(1939年12月22日),手写稿。

^④ 《稼夫同志关于晋绥历史问题的发言》(1947年7月)。

^⑤ 《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总结》(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93页。

^⑥ 《晋冀豫区委主干会议记录》(1938年10月19—20日),晋档,A01-01-034-002。

^⑦ 参见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页。

^⑧ 《论目前形势与战争动员——杨尚昆2月26日在区委第一次组织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2月26日),晋档,A01-02-001-002。

全面投降危机的前夜与开端”，太行军民要准备“两面作战”。^① 尽管，最终双方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国民党方面还是强化了对中共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封锁，其情治系统也加强了对太行根据地党政军机构的侦查与渗透。^② 国共关系裂痕加深，无疑给华北根据地的外部环境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这一阶段，华北各根据地面积均大为缩小，整个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根据地）从占据五六十个完整的县份，到1942年中减少到只有七个完整县，人口从1200多万下降到600多万。在日军“囚笼政策”的影响下，根据地版图不仅缩小近半，而且变得支离破碎。^③ 同时，长期战乱使得本地农业生产力持续下降，特别是粮食产量下降。晋绥根据地经济基础较差，虽非日军进攻重点却“因战争原因，1941年后面几年粮食生产都下坡严重，几乎到难以支撑”。晋绥方面试图联系晋察冀、晋冀豫根据地的同志，想借些粮食度荒；但在获悉晋察冀、晋冀豫更加困难时，不仅放弃了计划，晋绥根据地领导人林枫、贺龙还决定通过军区的渠道借给晋察冀区少量粮食。^④ 加之华北地区在1940年后水旱灾害频发，外部的经济封锁更让灾荒加剧，救荒度荒问题在这一时期几乎年年都令各级干部大伤脑筋，民众负担也越来越重。^⑤ 而且，各方势力均实行严厉的“统制经济”政策，使得区域内贸易凋敝、工商业进一步萎缩。这种状况在很长时间里难以得到改善，华北各根据地在经济上普遍遭遇严重困难。

在相持阶段如此内外形势下，华北根据地进入了最为艰苦的困难时期。这种艰难时势给干部进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干部损失问题。

据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统计来看，1940年8月到1941年8月，特别是在百团大战后，晋冀豫根据地干部队伍遭遇严重的损失，其烈度远远高于过去几年。仅从地、县、区干部“牺牲”一项来看，此一年时间内共有57个干部在战斗中牺牲，被捕后亡故者23人，病故者33人。^⑥ 与之对应，在1940年8月的组织报告中，三项数据加在一起才34人。^⑦ 冀鲁豫区党委也坦承：“自‘大扫荡’敌、伪、叛、顽、会门对我的夹击以来，不应否认的垮台及停顿现象是相当严重的。”^⑧ 在内外挤压下，冀鲁豫根据地县区级以上干部损失超过20%，“四分之三的县独立团垮的垮、插枪的插枪”，“一个县区级以上脱离生产的干部250余人，‘扫荡’后只剩下20余人”。^⑨

在中共有关干部损失数字统计中占大部的并非牺牲或病歿，而是那些动摇逃跑、消沉回家、贪污腐化、投敌叛变被开除的干部，这些干部中有部分人后来又归队了，但大部分人还是从此与革命队伍作别。各根据地党组织对此一般都有大体统计，但常常与实际数字差距甚大。因为，县级以下组织对确认的光荣牺牲干部往往会据实上报，而对干部叛变投敌这样的严重状况虽自己会有统计，但向上报告时常常会有所隐瞒或缩减。例如从太行根据地平东县1941年党员干部投敌叛变情况统计看，他们向地委汇报时称投敌叛变干部有18人，但县里留底的统计则写明1940冬年到1941

^① 《李雪峰在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1941年1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5页。

^② 《中央社会部指示》（1941年2月20日），晋档，A01-01-007-043。

^③ 参见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是怎样渡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财经困难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9页。

^④ 《罗贵波同志关于晋绥分局历史问题的发言》（1947年7月）。

^⑤ 《晋冀豫区各地各县工作汇报》（1941年5月），晋档，A01-01-044-138。

^⑥ 参见《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工作报告》（1941年8月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565页。

^⑦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工作报告》（1941年8月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576—577页。

^⑧ 《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总结》（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105页。

^⑨ 《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总结》（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101页。

年秋 10 个月内即有 50 多个区、村级干部^①投敌叛变。这个数字乍看会感觉相当惊人,因为一个县所有脱产、半脱产干部一般也不过 100 多人。细细想来则也不难理解,平东县所在的晋东地区(太行二地委)是日军“扫荡”的重中之重,是这一阶段受到侵害最为严重的根据地,地委书记陶鲁笳即在 1942 年 9 月的报告中提及:“昔西县二十六个支部被敌抢去,为敌利用。”^②如果此县 26 个支部中各有部分干部算作叛变,那么可能不止 50 个。而前述平西、平东两个县长黄晟耀、唐汉荣在 1940 年都先后叛变,使得这一地区政权机构在整党审干过程中进行了大规模改组,给原来与唐汉荣等人有些关联的政权干部带来极大震动,加上地方党在党内洗刷中有过激之失,太行二分区出现了大批“改旗易帜”的政权干部,区、村基层干部自然也不例外。^③

抗战相持阶段里干部损失严重,特别是出现较大范围叛变行为的地区,常会给此区整个干部群体的进退带来严重、持续之影响。地处山东根据地与冀鲁豫、晋冀豫根据地交界地带的冀鲁边地区东临渤海、西接津浦路和运河、南濒黄河、北到独流减河,对津浦铁路、天津、济南均构成直接威胁,成为抗战相持阶段日军“扫荡”之重点目标,干部损失情况一直很严重。冀鲁边军区成立时 3 个军分区 6 位军政主官(司令员、政委)到 1943 年时有 5 位牺牲,3 个地委也有 10 余位地委级干部牺牲。受形势吃紧、内部矛盾等因素影响,1943 年 7 月冀鲁边军区^④副司令员黄骅、参谋长陆道成等人突然被司令部手枪队长枪杀^⑤,司令员邢仁甫被认为是幕后指使者。邢仁甫在这年 10 月率少量部属投敌叛变,邢是有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在老家冀鲁边地区声望很高,震动整个山东根据地。此事件前后过程多少有些蹊跷,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无疑的是,“邢仁甫事件”对整个冀鲁边区党、政、军各系统干部群体的进退形成重大负面影响。事件发生后,直接随邢仁甫投敌的干部虽数量不多,但一部分干部因是邢的乡党、部下遭到洗刷,一部分干部则在张皇失措中脱队回家,冀鲁边区的军政组织几陷垮塌。上级组织虽大张旗鼓地纪念黄骅等烈士,但第二年初即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成立渤海区,新成立之渤海区是原清河区书记景晓村^⑥,原比景晓村资历深、党内地位高的王卓如任副书记,下面的地县干部虽也注意平衡,但地委正职多是清河区干部或新提拔的冀鲁边干部,冀鲁边的资深地方干部多被调上级党政系统任部门负责人或降职安排。这种情况又造成部分冀鲁边干部消极脱队,甚至有一些干部擅自离岗到其他根据地谋职。

正是由于抗战相持阶段里干部损失特别是叛变投敌问题加剧,华北各根据地面临的敌我斗争形势也变得更加复杂。一些叛变者在投敌后仍然与党组织有一定联系,他们或因“爱国爱党之心”未泯,或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同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有类似之处。而地方党组织为了生存、发展一贯需要对奸伪群体、国民党敌后势力进行渗透,这本是敌区工作和城市工作(当时亦称“点线工作”)题中之义,如今一些干部自然也不排斥通过叛变者得到诸多情报或工作中的便利。这种做法看似容易理解,但实际上令很多党内干部与叛变者的工作关系变得不清不楚,比如前述冀西某县级

① 包括党务、政权、群团、武装等各类干部。

② 陶鲁笳:《二分区组织建设提纲》(1941 年 9 月 28 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党的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8 页。

③ 晋冀豫区党委 1941 年 8 月统计的二地委政权干部叛变者,县级即有 17 人。参见《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工作报告》(1941 年 8 月 1 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4 卷,第 564 页。

④ 属山东根据地,冀鲁边军区当时是山东军区所辖六个二级军区之一。

⑤ 上级此时已任命黄骅担任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党校学习,但尚未正式宣布。

⑥ 景晓村本人对邢仁甫事件也有自己的看法,将邢的叛变看作是“宗派主义已发展分裂的爆发点”,他虽认为“邢变前,党对其认识不足,其弱点未有充分的估计”,却也觉得“邢变后惊慌失措,没有充分估计到邢之动摇性,贯彻争取的方针,而轻打并宣布其叛变,结果可以争取和平解决的问题而非常困难。这主要原因是不冷静,也有些宗派主义在内,党的宽大精神未充分把握”。参见《景晓村日记》,“1943 年 9 月 15 至 24 日条”,山东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渤海分会 2012 年编印,第 236—237 页。

干部就放走了叛变后做汉奸的旧同事,后来还通过此人帮忙搞贸易。也有一些本地干部,自身社会关系复杂,原本就有亲戚、朋友做了汉奸,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之保持联系,有时确为方便工作,有时也是私心作祟。在敌后工作的干部收受汉奸礼物就曾是普遍现象。^① 这些事迹起初多隐而未发,甚至为人所知却也不以为意,但在后来整风运动时,这些积累着的问题,即成为这些干部的“小辫子”“粗尾巴”,对干部的政治生命产生重要影响。

当然,面对严峻的困难,动摇逃跑、消沉回家的干部自然数量更大。在前面提到的平东县,县委统计的1939年到1942年逃跑党员干部有110余个,其中90%的逃跑日期为1940年底到1942年前半年。^② 根据平东县的原因分析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情况,逃跑者最主要、最直接的动因是不愿参军或不敢从事敌后武装工作。如原县级干部崔××,他在一次反“扫荡”中被指定带领一些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去他老家附近打游击,但崔××怕牺牲跑回家里不工作了。^③ 动摇逃跑干部统计起来不容易,因为相当一部分动摇逃跑的干部在过一段时间后会重新归队,他们虽有部分被开除出党但其中相当数量的人还是在为党继续工作,不少人后来也恢复了党籍。

形势紧绷、干部损失对华北根据地干部队伍本已大体成型的总体结构形成了严重冲击。1940年8月前,冀鲁豫二地委6个县的县委干部原有46个,到这年10月坚持工作的只剩下18个。^④ 河南滑县12个分区委单位44个区委干部,起初坚持工作者不过16个,一度曾只剩四五个干部。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坚持工作的”不仅包括牺牲、叛变、自首、下落不明、生病的一般之损坏情况,也包括上级考虑到工作条件不允许担心干部安危而予以调动的情况,其中相当部分干部是以受训名义被调回地委乃至区党委的。^⑤ 至于村干部,因上级无此余力加以调训、照顾,则往往只能自救。于是,一旦遭遇日伪之打击,便造成大量支部“分散和紊乱”。^⑥ 前述平东县那样的情况并非个例,晋中寿阳县、河北内丘县等地均出现几十个村的支干集体“维持化”(指听命于当地敌伪维持会等机构)的现象。再加上1940、1941年华北各根据地先后进行了整党、审干(不同根据地有不同的具体提法),对基层党员进行了大规模洗刷,各根据地党员数量普遍下降过半,基层支部在部分地区一度成为空壳而再无运作之力。种种情形造成的后果即是在严峻形势的挑战下整个干部队伍却一度有“头重脚轻腹中空”的倾向。^⑦ 干部队伍的调整、补充自然势在必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对干部队伍的准入门槛又有所放松,一些干部由此获得了晋升空间。例如在反“扫荡”中太行二分区干部损失严重,而作为昔阳县某区书记的马兴元(上世纪80年代曾任福建省省长)则坚持工作,于是先被提拔为县组织部部长,未几即升任县委书记。^⑧ 而在冀西元氏县同样是由于县里大批区级干部牺牲、脱队、叛变导致干部严重短缺,一批先前因种种原因被贬黜的干部重新被起用甚至拔擢。^⑨ 但从晋绥、太行、太岳几处根据地的总体情况看,受战争影响,提拔、培养干部数量还是相对

① 《李绪春个人材料》(1946年)。

② 阳泉市史志办:《李达三同志个人自述》(1988年9月)。

③ 《反扫荡里干部情形之一》,山西省平定县档案馆藏,未编号。

④ 《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总结》(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106页。

⑤ 《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总结》(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102、106页。

⑥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工作报告》(1941年8月1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546页。

⑦ 当然,这只是个相对的说法,根据地区党委、地委一级其实也常有干部缺额,但机关较之于下面急缺干部的情况仍显得臃肿了些。当时晋冀豫一地委书记高扬即反思为保护干部,将他们大量调地委、专署,调研室、巡视团有40多个干部,连目不识丁的区长都在调研室任职。《晋冀豫一地委批评会记录》(1941年3月15日)。

⑧ 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信念永恒:马兴元纪念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13页。

⑨ 牛建平口述,赵诺记录:《牛建平访问记录》,2006年7月12日。

较少。

如此情形似应大量提拔补充干部,但中共中央倡导之“精兵简政”方针对此也多少有些影响。在根据地缩小、供给紧张情况下,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自然没错,最初也非专意因应前述干部结构问题,但精简机关、充实基层仍是其中一项重要考量。据时任北方局组织部科员的李新回忆:

1942年秋后,为了实行精兵简政,北方局在它的属下成立了太行分局,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这样,北方局下属便只有晋西北、晋察冀和太行三个分局而没有直属的区党委了,它的机构非常精干,每个部只有三几个人。例如组织部便只有部长刘锡五、部员郭森(干部科长)、部员李新(组织科长)和一个干事周金光。^①

不独北方局机关如此,晋绥根据地晋西北区县级以上各系统机关均对脱产干部^②做大量精简(见表1):

表1 晋西北区党政各系统机关精简前后人员编制对照表

单位:人

	精简前	精简后	备注
党务	2021	1647	所有地委机关皆与分区司令部合为一个伙食单位,县委机关皆与游击大队合并(秘密者除外),以区党委一级的干部加强地委以地委一级的干部加强县委。
政府(区级以上)	10025	4100	内地区专署、县府合并为四个科室,游击区只有两科,合并小县小区小村区政府只设一个助理员。
群团	1265	449	干部重新分配原则:加强下层,保留地方干部及在群众中有信仰者,提拔非党干部。
学校	1775	1125	游击区两个中学合并于内地区两个中学;各干部学校合并于师范学校,所有学校都提高质量及待遇。
总计	15086	7321	

资料来源:《晋西北党政军民各组织精简前后脱产人数及编制报告》(1942年12月11日),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写办公室:《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内部资料)第4卷,1994年版,第44—45页。

由此不难看出,晋西北区在精兵简政过程中压缩了超过半数之脱产工作人员,其中政府、群团部门力度尤大。人数减少自然伴随着机构撤并,此一时期,以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晋西区党委合并为晋绥分局为契机,撤并大量党、政、军、群机关,分局一级机关中有大约超过30%的干部被降职安排,还有超过15%的干部被下派到地、县级机关中。这种做法的确有利于“精兵简政”,却也带来干部对个人前途的失意乃至悲观。^③而此类问题绝非仅仅是晋西北区独有。^④

于是,在形势转变后出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干部严重损失造成基层岗位缺额巨大,给予基层干部更多上升机遇,但精兵简政带来县级以上党政军群机关里机构、编制收缩,又直接或间

① 李新著,陈铁健整理:《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190页。

② 包括部分脱产之工勤、卫戍人员。

③ 《赵林同志关于晋绥分局历史问题的发言》(1947年7月)。

④ 参见把增强《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3年。

接抑制了干部走向中层以上领导岗位的上升机会。这与后来整风运动中干部群体内的矛盾直接关联。

二、轻重之间：忠诚度与能力

对于欲以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且组织严密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忠诚度必然是干部任用的核心标准。一般来说，叛变、通敌之类的不忠行为，往往会遭到极为严厉的惩罚和制裁，因为党内干部一旦有此类行为，会给组织带来极大的损失。比如，对一些投敌做汉奸并出卖同志的前中共干部，地方党会把他们放到锄奸目标清单的最前列，常常不惜代价寻机处决。不过，在日常工作中，只要不涉及“叛变”等问题，“忠诚度”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考核的标准，判断一个干部是不是足够忠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甚至是随意性。

面对这样的实践环节的操作难题。中共有其富有特色的一套办法，即审查干部（简称“审干”）。严格说来，审干并非是在整党整风过程中陡然出现的组织行为，“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审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既定政策”。^①但实际上，因战争、革命的环境制约，中共的审干往往只能在特定时段集中进行（多伴随整党整风）。

华北各根据地孕育期，中共领导层也曾强调干部的忠诚度问题，特别要求做好审干工作。^②但主要还是频繁鼓励各根据地党组织大量发展党员、改变关门主义倾向。^③因故，在干部队伍迅猛扩充的同时，干部思想观念上忠诚度问题多少还是被忽视了。

在冀西元氏县，一些老地下党干部即先填了表格再上交以供审查；之后特委组织部长顾卓新又和他们分别谈话，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和担任过的党的职务，失掉关系的原因及个人情况，经此审查程序后他们方才算恢复组织关系并出任县、区级干部。^④不过，这样的审查总体上是不够严肃深入且缺乏系统性的，基本成了走过场。这几个老地下党员看似经历了较为严格的审干程序，实际上有“走形式”的嫌疑，因为仅仅几天后他们这几个人就被组织照单全收，所有人都恢复组织关系并当上了县里的干部。可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批干部中竟有过去杀害党的特派员、抢走活动经费的人存在。^⑤总体上看，由于根据地初建期干部极为短缺，地方党的领导人于主观上自然缺乏审查干部的动力。^⑥某县的干部都忙着去发展党员，一个尚未入党的青救会干部，因为文化程度稍高，竟被县委书记安排负责审查老地下党干部的历史问题。^⑦

同时，不得不承认，不少新干部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初是出于私利算计，而缺少对中共及其革命事业的忠诚。即使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青年学生出身的干部，走上革命道路时是为找出路的也数量不少。如山西平定人王谦，是个初中毕业生，他虽在读书期间即对马列著作有所涉猎，在现实与理论世界的相互印证中萌发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但在投入革命浪潮之前的谋生道路上处处碰

①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8页。

② 《刘少奇、杨尚昆关于山西工作给张闻天的报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③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页。

④ 智世昌：《在抗日战争的沧桑岁月里》，中共元氏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元氏县党史资料》（内部资料）第2辑，1992年版，第151—152页。

⑤ 牛建平口述，赵诺记录：《牛建平访问记录》，2006年7月12日。

⑥ 参见《晋冀豫区党委会议记录》（1940年8月），晋档，A01-01-042-003。

⑦ 阳泉市矿务局档案馆编撰：《贾慧生局长回忆抗战八年》，未编号。

壁,是在半失业状态中被朋友介绍进“公道团”(牺盟会外围组织)里的,其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仍然夹杂着“求生存、找出路”的考虑。^① 河北邢台的李庆伟投身革命后表现很好,但最初是为了依靠组织报自己的私仇。^② 希望“仗势做官发财”的干部更是非常普遍。^③ 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有些干部原本对党即缺少发自内心之忠诚,也缺乏艰苦的斗争考验和严格的教育训练,不少干部在遭遇战争和国共摩擦的考验时,惊慌失措、全无斗志,甚至“一到困难到来就有逃跑叛变的现象”。河北赞皇、磁县均是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的地方,在抗战初也是工作上的先进典型,但在1940年遭遇困难时,出现了区级干部大批叛变、下层党组织垮台的状况。^④ 类似事件在此一时期之华北各根据地确是屡见不鲜。

于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内外形势日益趋向严峻之时,中共决意在干部工作上突出忠诚度问题,开展整党审干。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9年8月25日做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此决定强调,“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在审查党员特别是审查干部的经常工作中去发现和洗刷混入党内的敌探奸细托派分子,叛徒和堕落分子”。^⑤ 中组部在10月7日又下发《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再次敦促各根据地党尽快发动整党审干,并对具体环节、方法做出布置。^⑥

大体而言,从1939年后半年到1941年,尽管因战争影响并未形成后来整风运动那样的一致行动,但华北各根据地大多还是先后进行了短促、有力之整党活动(有的根据地称“整顿支部”),审干则以隐秘方式同期进行。由于此次整党审干采取外宽内严之组织处理方式,而未与群众运动形式相结合,所以较少受研究者关注。

从审查对象上看,根据地内各级、各机关中的干部全部在内。审查次序主要是自上而下,由已通过中央审查之根据地领导人先审本级其他领导干部,然后逐级层层审查,党政军群各系统干部均无例外。^⑦ 审查的标准原则是丰富全面的,包括阶级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历史、能力水平、日常表现等诸多方面。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明显主要指向干部的“政治忠诚”问题。冀鲁豫根据地鲁西区党委即认为审干的目标主要是保证“各级党的机关掌握在经过考验与忠实可靠的干部手里”。^⑧ 太行根据地领导人李雪峰则要求审干“先从有问题的面貌不清的着手”。^⑨ 而最终审干的重点人群有两个:一为自首过又重新入党的干部,二为历史上失掉组织关系后又恢复的干部。^⑩

因此,审干中首当其冲的是一批层级较高的老干部。比如当时已升任地委书记的赖若愚曾在1930年到1932年入狱近两年,后来在被派回山西地下党工作时又曾因组织连遭破坏而脱队回家一年多时间,这样的经历自然使赖若愚成了“审干”的重点对象。李雪峰留下一段颇有意味的回忆:

① 张国祥主编:《王谦:一个省委书记的风雨征程》,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2页。

② 《李庆伟个人材料》(1946年)。

③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1940年6、7月间),晋档,A01-01-068-001。

④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1940年6、7月间),晋档,A01-01-068-001。

⑤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1921.7—1949.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520页。

⑥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1921.7—1949.9)》,第521页。

⑦ 《晋冀豫区党委会议记录》(1940年3月21日),晋档,A01-01-041-001。

⑧ 《鲁西区党委关于审查党的工作指示与决定》(1940年12月2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376页。

⑨ 《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总结》(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376页。

⑩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1940年6、7月间),晋档,A01-01-068-001。

约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在黎城我就干部问题和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建设问题,专门找小平同志汇报了一次工作。当时,刘伯承同志、朱瑞同志也在场。我记得当时主要谈了两件事:一是关于恢复赖若愚同志党籍的问题。赖若愚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当时被党组织派到山西运城担任巡视员时,因白色恐怖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有一段时间回了老家。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很大,他也正在接受组织审查。我觉得这位老党员没有变节行为,当时的革命形势也确实需要干部,尤其是他这样的老同志。朱瑞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没有表态。小平同志态度明朗,语言干脆:承认嘛,白区工作环境那样艰苦,失掉组织关系的事情常有。家乡熟,回去有什么关系,应该恢复他的党籍。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我们很快为赖若愚同志恢复了党籍,安排了适当的工作。^①

在党内原本比赖若愚资历还深的顾卓新就没那么幸运了。顾卓新在1940年时已担任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并实际主持部务。^②但顾卓新过去在担任地下党北平市委代理书记时因内部争论挨了处分,他觉得受委屈跑到上海向中央申诉,结果问题没解决却被捕入狱,到抗战前才获释。他原本是根据地审查干部工作上的主要负责人,经他审查、考验而派遣、介绍出去的干部数量不少,可殊不知,自己却在“审干”中被抓了反面典型。顾卓新的个人传记中叙及此事时,一般称是因为“过去北平时代所犯错误的问题未交代清楚”。^③但实际上,由当时形成的档案材料来看,顾卓新的“罪名”是“自首分子”^④,那么他的历史问题很可能出在去上海后被捕入狱这段时间里。正因为这个“帽子”,顾卓新被停职审查近一年时间,在历史问题未能释疑的情况下被降为太行军区政治部动员科长。^⑤

与顾卓新遭遇类似的还有晋绥根据地雁北地委书记赵仲池,他是原地下党河北省委的资深干部,同样因被捕入狱的经历被扣上“自首分子”的帽子,在背对背的情况下给予“警告”处分。赵仲池从区党委委员、地委书记的位置直降为区党委机关报社的采访部主任,七大代表资格也被取消,此后一直未获重用。^⑥

根据这三位干部的例子,可以看出,忠诚度毫无疑问是审干的核心指向。对党组织而言,无论顾、赵二人是否真有变节问题,历史不清的疑点本身也并非全然捏造。敌我斗争气氛渐浓后,在不能弄清全部事实的情况下,选择宁苛勿纵的政治审查标准,在逻辑上亦有其合理性。但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往往会产生较多副作用,形成冤假错案,对干部个人的政治发展和精神状态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受到审干冲击的绝非只是个别高级干部。仅据冀鲁豫根据地在1941年3月不完全统计,已在审干中发现“不合入党手续的156人,失掉关系或脱离过党的18人,参加其他团体(三青、复兴、会门)80人”。对这些干部的处理办法是“缩短党龄18人,警告14人,留党察看115人,停止党籍6人,劝告出党1人,开除39人”。在这些被处理的干部中有县级干部18人,区级49人,村级89人。^⑦

① 李雪峰:《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军事家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

② 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长何英才调晋豫区党委书记(随即又调北方局工会工作),但并未正式免去部长职务。

③ 参见周才裕《顾卓新》,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350页。

④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1940年6、7月间),晋档,A01-01-068-001。

⑤ 参见周才裕《顾卓新》,《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7卷,第340—350页。

⑥ 参见中共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科学出版社办公室编《赵仲池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⑦ 《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总结》(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186页。

对这些因“忠诚度问题”受到处分或怀疑的干部,另一个重要的安排方式是送去党校学习,有的直接被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去,有的则留在根据地内各级党校。在党校中他们可能继续接受政治审查,同时也按部就班地学习党的理论、历史、政策等有关课程。有干部后来回忆:

在党校学习的同志,有不少人是在工作中和战斗中犯有错误,思想上背上包袱、准备来挨整的。来党校后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开动了脑筋,提高了思想,认识了错误。从而放下了包袱,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明确了努力方向……同志们都把党校看成是他们再生的母亲、母校、革命熔炉……他(冷楚——时任晋冀豫区党委党校副校长)是大家尊敬的校长。^①

除了停职学习,还有部分干部被动“转岗”。举例来说,部分党务、武装工作干部被调去从事财经工作常常并不是因为“学历高”“懂经济”,而是在审干发现“疑点”,被认为不适合再担任要职,而被调去工商局、工厂、企业了。^②也有一些干部则被调去从事文化、新闻工作。^③

另外,笔者发现,当时在审干中被查出存在不忠问题甚至被开除党籍的干部,还可能被安排去从事敌区工作,比如晋察冀平北县委书记李达三^④、晋冀豫平西县原县长刘增钰、榆社县原游击大队指导员刘福德均因历史上犯过错误而被派到敌占区工作。^⑤他们虽然一度被停止党籍但依然作为“同情层”或“中间层”继续为党工作,同时也可算作接受党的考验、等待查清问题、争取恢复党籍。

当然,深挖忠诚度之类的极具主观色彩的问题,自然难免中共屡纠屡犯之偏误。在前述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后不久,1939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还下发了《中央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此决议虽注意强调禁止肉刑、要求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却也将内部奸细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并把反奸与审查干部直接联缀在一个逻辑链条中,即“考查干部和党员——寻找敌探、奸细、托匪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发现认定后坚决清洗”。^⑥而在根据地整党审干开展过程中,党组织常常将这几个文件混在一处进行传达。在狠抓不忠干部的审干之大方针下,又与“肃托”“反奸”等其他因素相纠葛,华北根据地不少地方发生了过激事件,许多干部不仅政治前途蒙尘,甚至失去生命。“湖西肃托”其实并非孤立个案。据研究显示,山东根据地鲁中泰山区也错杀干部群众240余人,其他清河区、鲁西区、鲁南区等地也至少处决干部数十人。^⑦这些事件均是在审干的背景下走向极端的。

“忠诚度问题”不仅仅触发于审干这样的政治整顿中。在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同样有一批干部曾经被日伪军捕去或俘虏,尽管部分干部最终牺牲,还是有不少干部后来逃脱或者被释放。在当时,具有此类经历的干部与过去那些“出狱干部”一样,会遭遇组织的怀疑和审查。冀西沙河县武委会主任兼独立营政委王占国即有这样一段经历:

① 申春、冷允澈:《冷楚纪念集》(非正式出版物),1993年编印,第79—80页。

② 《左力夫个人材料》(1946年10月14日)。

③ 如建国后曾任山西省省委常委、秘书长的史纪言本为力量较强的黎城游击队政委,因在审干中被查出曾加入过国民党且与著名托派张慕陶有过来往,又考虑到史文化水平较高还办过杂志,故被调去办报。参见《史纪言个人材料》(1946年)。

④ 平定县委党史研究室:《李达三同志访问记录》,1984年6月。

⑤ 刘福林:《六十年春秋风和雨——回忆大哥范五》,《榆社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全国政协山西省榆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年编印,第32—50页。

⑥ 《中央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1939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185页。

⑦ 参见丁龙嘉、张业尚《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肃托”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942年8月,敌人包围住,在草房内隐蔽,改名叫王玉林,承认是排长,交了敌人枪,捕后把他放在特务队,翻译□(此处一字不清——引者注)谈话,以后送他治安队,遇见两个战士,这两个战士和一管理员,三人与他一起被捕。敌诱惑,给他找老婆,后行军走到□□岩(应是地名——引者注),前是日本人,后是治安队,中间是他们,半路逃跑。^①

这段被捕又逃脱的经历应来源于王占国个人的陈述,但组织上后来却在这段经历后批注了两条内容:

1. 沙河公安队员投敌,知道他是我方大干部。
2. 当时伪军□□,动员他,如何应付?^②

这两条批注堪谓“犀利”,只是组织上并未给出结论。不过,这个故事说明一段短暂的被捕经历足以引起组织对干部个人的严重不信任。王占国是根正苗红的煤矿工人出身的干部,却自此背上了历史包袱,回来后“垂头丧气,不想回部队,愿去种地”。^③不久,王占国则被调去太行党校整风班参加整风,一“整”便是一年多,等他从党校出来后只被安排为河北内丘县抗联会主任。

在平日里,“忠诚度”还是容易变成“忠厚老实”之类的泛泛说辞,有时甚至蜕化为对领导个人之忠心。特别是到了抗战相持阶段,为集中决策渡过时艰,1941年之后中共在华北敌后根据地特别是一些边缘区大力强调党政军一元化。这不仅仅体现于像秦基伟、罗舜初、梁必业等正规军高级干部兼任根据地部分边缘区党委书记,更体现于此前组织正规化的趋势遭到遏止,地方党组织总体上对个别人的依赖性强化,抗战初曾比较普遍的“个人领导”问题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又加剧了。在一些地方党的领导人那里,“对党忠诚常常只得变成对书记忠诚”。^④这种倾向常常是一级级效法、一级级庸俗化。到了县区里,一些干部平时做县委书记的“跟屁虫”,给县委书记搞到羊肉吃,便被县委书记当作“忠实可靠”干部而被提拔为区长。有趣的是,提拔这位干部的时候,县委还特别给出“在建立县工作领导核心问题上态度鲜明,是尊重县委指示的模范”的评价。^⑤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忠诚度”是个前提,是在某种特殊条件或特殊时段里予以检验。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只要不触发自首、叛变之类的重大政治红线,能够实实在在核验干部的标准还是“工作能力”,尤其是在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之后。在各种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强调最多的干部选用、分配标准还是工作能力,而不过分拘泥于政治教条。^⑥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干部问题上的灵活性,也是与干部来源、干部思想现状做出的妥协。当然,在党的路线总体发生转变后,“统战”大环境确实也让党在干部问题上有了更大的选择和腾挪空间,而不须像苏维埃革命时期那样在苏区不顾实际地推行阶级纯化的干部政策。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时期迅速崛起的干部的确也大多是有能力的干部。

前述晋冀豫根据地的赖若愚,因过去那段“脱队史”的党籍问题一直以“存疑”方式搁置,来晋

^① 《王占国个人材料》(1946年)。

^② 《王占国个人材料》(1946年)。

^③ 《王占国个人材料》(1946年)。

^④ 《陈漫远同志关于晋绥历史问题的发言》(1947年7月)。

^⑤ 《平东县组织情形》,平定县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未编号。

^⑥ 《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述(初稿)》(内部资料),中共山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1983年编印,第24—25页。

初期只担任晋城中心县委书记,职级比同等资历者要低。^①晋城虽设中心县委,实际上工作基础很差,但在赖若愚等人领导下,晋城县各方面工作均取得突出业绩,仅组织工作方面来看,从1938年初到1939年初,党员从50人发展到5000多人,经晋城县委培养,其中一大批晋城的干部被输送出去,成为重要领导骨干。^②赖若愚在1939年初调任晋冀豫区委党校副校长,未几升任校长。在党校期间,赖若愚在建章立制方面也取得较多突破。这年7月,赖若愚又接替被派去延安学习的陶希晋任太行二地委书记。当时,因二地委辖区是日军“扫荡”的重中之重,所以此地干部面临严峻考验,太行区党委一位领导讲:“检验一个干部的生死观,最好把他放到二分区。”^③赖若愚在地委书记岗位上依然发挥出色,同为地委书记的高扬在做自我批评时即表示“自己能力不足,须向赖若愚同志学习”。^④当然,赖若愚的上升原因并不简单,此期中央大力强调“干部地方化”,赖若愚作为山西本地人,算作本地干部培养的典型;同时,赖若愚与同乡李雪峰关系亲近^⑤,赖若愚在北平期间就在李雪峰直接领导下工作,自晋城县调到区党委党校后依旧是校长李雪峰的助手。但短短两年多时间,赖若愚即迅速从一个“成分不好”“历史不清”的干部上升为根据地内令人瞩目的本地政治明星,绝非是靠着籍贯、乡情或是政治亲缘,而主要是工作能力得到广泛认可。

尽管能力的指向并不唯一,但在诸多方面的能力中,各根据地党最看重的是“独立工作”能力。当时,敌后根据地常常会因日伪的军事行动而出现区划变动乃至交通隔绝问题,地委、县委甚至区委的领导人均会面对与上级联系突然中断的情况,这时是否还能灵活处置各种棘手问题、维持组织的运转,对于干部群体而言就至为关键。邢台人李某虽一贯不那么听组织的话,屡次违反上级命令不肯去党校学习,却在工作中既善于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也具有一定的武装工作能力。最终,他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即从普通党员升任邢台县县长。值得注意的是,组织部门原本给他评价为“有魄力、能开展但对组织不老实,也无阶级觉悟”,但到提拔时把话锋一变,就改成了“阶级觉悟还不清晰,但为阶级而斗争、工作的意识却强,有时爱自作主张,但也有为党和边地群众独立工作的意志和能力”。^⑥可见,用意识形态化的修辞终能把褒贬判词都下得合情合理。

当然,要想独立工作,关键需要武装工作能力。前述马兴元在此时期获得较快提拔,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早接受过军事训练,善于从事敌后武装工作。^⑦对于地方党来说,在战争压力下保证组织生存、发展还是首要目标。到了县里、区里,有时候谁能在一地方立得住脚,谁能把武装拉起来,往往就能得到上级的赞赏与重视。作为本地干部的王谦在短时间里将被人称作“讨吃队”的平东抗日游击队搞得有声有色,如此出色的能力让他一度成了八路军和地方党抢着要的干部,地方党领导人硬是给八路军写信要求把王谦留在平定县任县委书记。^⑧

既然能力强者上升,自然会有被认为能力不足的干部遭遇降黜。工人出身的干部高彩章,是山西榆次工人游击队中的积极分子,但最初也只是个普通战士。^⑨后来因工人干部出身、为人勇敢,

^① 如同样随刘少奇来晋工作的温建平,资历虽浅于赖若愚却直接担任河东特委组织部部长,担任夏县中心县委书记的傅子和则更是不如赖若愚。

^② 李贵仁:《赖若愚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③ 牛崇辉主编:《赖若愚纪念文集》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820、822页。

^④ 《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记录》(1941年7月)。

^⑤ 赖的党籍问题也是李雪峰亲自去找邓小平而得以解决的。参见《回忆军事家邓小平》,第557页。

^⑥ 《李庆伟个人材料》(1946年)。

^⑦ 《信念永恒:马兴元纪念集》,第7—13页。

^⑧ 张国祥主编:《王谦:一个省委书记的风雨征程》,第72页。

^⑨ 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被迅速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到 1939 年时已担任榆社县委书记。不过,他在榆社工作的这段时间并没有多少业绩,据继任者王谦回忆,他上任之初便听当时榆社县委干事说:

这里的县委不起什么作用,老刘(刘建勋)在时还马马虎虎,新来的那位工人出身的县委书记(指高彩章——引者注)呆了几个月,县政府和牺盟会的人都看不起他。他找人家,人家不买账,不见他。^①

出现这种状况,自与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矛盾有关,但也不难看出,高彩章个人能力着实有限,几乎遭县政府、牺盟会的“无视”。高最初被调任邻近县担任副书记,此后地位持续下降,建国后也只做过北京国棉三厂党委书记。

工作能力不仅仅是经验和智慧的外化,也是体力、热情的体现。在上级党组织对黎城县委书记进行巡视时,发现县组织部长董用芳觉得自己“老而无用,内心非常苦闷”,而这种心态使得董用芳在工作上显得“力不能及”。因此,董用芳被调离县委,继续回乡办教育。^②

有时候,干部本身或许并非能力薄弱,但依然可能因工作成绩不佳或严重失误而被党组织视为能力不足。例如,山东根据地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就因在清河区、鲁中区均长期无法打开局面而左迁为沂山地委书记。“湖西肃托”发生时担任区党委书记的白子明虽没被认定为“奸细”或“暗害分子”,但也因此重大过失而被降为《大众日报》社编辑部主任。这样的干部便需要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向组织上证明自己。

不过,选拔忠诚度和能力俱佳的干部,其实永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根据地党组织自己也常常为“忠厚老实”与“能力出色”不可兼得而苦恼。^③而在现实中,这两者确实也时有歧异,难以求全责备。因此,如前所述,对于忠诚度和能力的评价,根据地党组织善于把具体内容上升到方针政策等革命的大道理上去,以意识形态的修辞对干部忠诚度与能力的评价标准进行调和,这很大程度上弥合了两个标准之间的落差。在干部进退升降问题的处理上显露更强的说服力。例如农民出身的冀西某县县委书记和农救会主席在反摩擦斗争中表现不佳,被认为“斗争性弱”,二人均被撤职;不久,国共关系稍缓,地区成立农救会,没有合适人来做主席,便又想到这位赋闲的县委书记,他的履历便成了由县委书记调任地区农救会主席。而原来的县农救会主席返家一段时间后,也因熟悉情况被重新任命为区长。此时,地委组织部长又向大家解释说这两位是“不忘统战”。^④

三、虚实之间:干部成分与群体遭际

尽管实践层面常有几分灵活性,也带着些许纠结,但中共一直并未放弃对干部队伍阶级属性的强调。那么,在抗战相持阶段,干部的成分依然对个人在组织内的进退升降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段、不同范围常常有虚有实。

目力所见,自 1939 年华北各根据地初步巩固后,中共的各种文件、报告中一直频繁表达对根据

① 张国祥主编:《王谦:一个省委书记的风雨征程》,第 72 页。

② 《冀豫晋省委会议记录》(1938 年 9 月),晋档, A01-01-032-003。

③ 《太行区党委第六次组织联席会议记录》(1945 年 2 月),晋档, A01-02-008-001。

④ 《晋冀豫区党委第一次组联会会议记录》(1939 年 3 月),晋档, 编号佚失。

地基层干部成分状况的不满。尽管在根据地,党从一开始就强调提拔工农干部,也培养出个别工农干部典型,特别是部分工人干部(当时干部政策仍强调工人的领导地位)。^①但总体上看,根据地基层干部此时主要是两类人:一是成分不好的地富干部,另一部分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则多属“流氓无产者”或“乡村边缘人”。在上级党组织眼里,他们“大多是成分不大好、有流氓气的干部”。^②确实,即便是有些革命传统的地方,老底子很多时候是江湖经验丰富、善于取巧的能人。比如因革命传统深厚而闻名的河北赞皇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虽是师范毕业,却是本地枪会首领出身,娶的老婆也是个风尘女子,而县里地下党出身的区级老干部许多是枪会师傅出身,常有“流氓气”。^③不仅仅是赞皇存在这样的现象,牺盟会大本营山西沁县、沁源县,老干部中“流氓”成分多的问题也曾困扰着地方党。^④

在1938年春夏组织大发展热潮前,不少地方党在组织发展、干部提拔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一度出现所谓关门主义倾向。但此后在中央及各级领导机构推动下,华北各根据地开始大量吸收党员、提拔干部。矫枉过正之形势下,许多地方不再注意成分来历,党员干部的成分自然越发复杂起来。当然,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在华北乡村地区发展组织,受基本的人口比例制约,即便是没有严把成分的人口,基本社会构成决定了党员中数量占主体的仍然是普通农民(中、贫农)。但确实不少富农(地主出身者较少)也被吸收入党,且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富农被提拔到干部的位置,一些被他们领导的基层党支部即成为所谓被阶级“异己分子”把持的支部。期间,有的地方甚至成立富农支部与贫农支部形成对立。^⑤

富农干部的政治表现其实并非“一无是处”,但应当承认的是,他们中大多人是在特定条件下表现积极,当他们的利益受到较多损害时便保留较多。^⑥只是,在这一阶段,地方党的核心诉求与上级强调阶级的笼统原则并不一致,到了县一级党委,完成工作任务仍是他们的根本目标,这是“生存伦理”决定的。于是,他们在提拔干部上总体上有“重才不重德”倾向,即看重干部在乡土环境里能力和地位,而忽略成分、德行等问题。^⑦比如晋绥边区即认为抗战初选拔大量“善于投机取巧的干部”,1941年困难到来时“投降叛变的多系这些分子”。^⑧而山西武乡将提拔干部的标准具体定了三条:1. 能说会干;2. 稍有文化程度;3. 有空间时间活动与工作。依此标准,贫雇农基本已被排除在外。^⑨

在“统战”的背景下,初来乍到的共产党人并没在群众运动中提出多少阶级斗争口号。面对改善民生、合理负担等短期措施或局部之群众运动,地富阶层似乎也尚能勉强接受。但到1939、1940年之后,政权改造、借粮运动以及后来的减租减息对根据地的地富阶层已刺激强烈。国共间日益激烈的“摩擦”问题,也让共产党人同与国民党敌后力量存在联系的部分“地富分子”隔阂更深。这样一来,地富出身的干部越来越被党组织视为必须清除的“坏成分”。

如果说前节叙及的各根据地先后展开的审干主要针对中上层干部,那么整党则围绕着成分问题,对基层区村干部形成不同程度的洗刷。本文在此略过一般过程,只讨论该期间成分问题与基层

① 《太行区党委第六次组织联席会议记录》(1945年2月),晋档,A01-02-008-001。

② 《太行区党委第六次组织联席会议记录》(1945年2月),晋档,A01-02-008-001。

③ 《李绪春个人材料》(1946年)。

④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1940年6、7月间),晋档,A01-01-068-001。

⑤ 李秉奎:《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121页。

⑥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1940年6、7月间),晋档,A01-01-068-001。

⑦ 在当时地方党组织的各种文件、报告中,常常把干部成分和德行关联起来,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⑧ 《三年来晋绥边区的组织工作》(1941年1月30日),《山西革命根据地》(内部刊物)1984年第2期。

⑨ 《三年来晋绥边区的组织工作》(1941年1月30日),《山西革命根据地》(内部刊物)1984年第2期。

干部进退升降的关联。

晋绥根据地从1939年底即开始整党。晋西北区党委以各级组织闭门划线的方式在两个多月里开除了4000多党员,换了六七成村干部。^①从1940年4月到8月,4个月里晋冀豫根据地减少了三分之一党员,清洗数量近万,这显然属于非常规的、迅疾的组织收缩。而在局部,党内洗刷可能更加剧烈。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何英才即谈道:“如×县过去有1000多个党员,经过整理后只剩100多党员了。”^②这个例子并不是孤立的,邢台、武乡、黎城、临城、赞皇等原来基础较好的县均出现了“简单的大清洗”。^③

党员人数陡降对地方党组织的实力自然影响很大。而且,因村干部原来多为富农、中农出身的党员,在整党后几乎被洗刷大半,大量支部因群龙无首而陷于瘫痪。河北某县有一半左右的村支部均因洗刷过猛而濒临解散,过半村子没了村支书,同时大量枪会出身的勇敢分子被开除出党,指令传下去也没人手去做工作。^④

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党内清洗对基层干部的心理也造成负面影响,即便是贫雇农都一度不愿意出来担任干部。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长徐子荣自己也承认很多地方的支部在处理时引起很大震动,留下很坏影响。^⑤何英才更是认为:“许多县的整理组织,形成大量洗刷党员,任意玩弄党员的政治生命,造成了党内恐怖。”^⑥

初读史料,容易感觉整党对区级干部队伍的影响较小。因为在当时形成的各种报告或总结中绝少提到分区委干部的具体整顿情况。但在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中在论及分委干部现状时提到:“现在分委绝大多数都是在整党工作期间勉强提拔起来的,他们成分与工作积极性都很好的,但是能力却很弱。”^⑦如此看来,分级干部群体的构成情况应发生较大变革。如果我们对比一下1939年10月和1940年8月晋东、冀西两地^⑧分委干部党龄状况(见表2、表3),不难发现群体构成的变化。

表2 晋冀豫区晋东、冀西分委党龄统计表(1939年10月)

单位:人

	半年以上	一年以上	一年半以上	二年以上	二年半以上	三年以上	合计
晋东	4	15	38	11	1	6	75
冀西	1	22	52	12	0	0	87
合计	5	37	90	23	1	6	162
比例	3.1%	22.8%	55.6%	14.2%	0.6%	3.7%	

资料来源:《晋东、冀西分委成分统计表》,晋档,A01-01-068-001。

① 《李井泉同志关于晋绥历史问题的发言》(1947年7月)。

② 何英才:《晋冀豫边区巩固党的几个问题》,《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803页。

③ 徐子荣:《关于八个县的支部工作》(1942年8月30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党的建设》,第252页。

④ 《贾慧生局长回忆抗战八年》,未编号。

⑤ 徐子荣:《关于八个县的支部工作》(1942年8月30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党的建设》,第252页。

⑥ 何英才:《晋冀豫边区巩固党的几个问题》(1940年12月6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803页。

⑦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1940年8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554页。

⑧ 机构调整后一、三地委治辖范围大致对应晋东、冀西地委,整党后分委数量大幅减少,故分委级干部数量也减少。

赵诺 / 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

表3 晋冀豫区一、三两地委分委党龄统计表(1940年8月)①

单位:人

	半年以上	一年以上	一年半以上	二年以上	二年半以上	三年以上	五年以上	不详	合计
一地委		4	11	21	15	4	0	3	58
三地委	1	7	18	36	0	2	0	1	65
合计	1	11	29	57	15	6	0		123
比例	0.8%	9.9%	23.6%	46.3%	12.2%	4.9%	0	3.3%	

资料来源:《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574页。

由于1940年8月比1939年10月要晚10个月,所以党龄一年半以上的干部党龄全都会变成两年以上甚至两年半以上。这样看来,1940年8月时两年以上和两年半以上的分委干部所占比例明显偏低。特别是三地委在1940年时竟然已几无党龄两年半以上的分委干部。由此推知,这群区级干部恐怕已与1939年10月时的那一群人有较大区别,在未有大面积提拔的情况下,应有相当数量的分委干部在整党中可能遭遇了降级、撤职甚至是“清洗”。尽管难以对这些被革命队伍“辞掉”的人群有一总体把握,但还是可以捕捉到他们中个别人以激烈方式留下的少许回响。在中共自大革命时代就扎下深根的河北磁县,有4个曾任区委书记、区长的老党员因成分不好而被清理出党,他们在去地委陈情无果后,以集体缚石沉河的方式表达冤屈。②

清理“坏成分”的同时,自然也需要提拔一些成分好的干部。在1939年底强调巩固组织到整党审干这一段时间里,结合群众运动,华北各根据地里很多出身好的农民干部获得了抗战以来最佳的上升机遇期。③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农民干部在中下层政权、群团系统④里往往获得提升机会更多,党务系统则比较少。结合前文记述,对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国共关系趋紧、统战政策淡化的前提下,过去对出身、成分要求低些、容纳较多地方闻人的政权、群团组织洗刷更剧烈,留出编制空缺也更多些。

不过,1942年之后由于敌情严重、经济困窘,根据地党组织已普遍发现之前提拔的这一批农民干部能力不足以应付紧迫局势,因此在日常基层干部选用过程中又放宽了干部成分的准入门槛,但吸纳规模比抗战初则要小了不少。⑤

依据笔者对华北5个根据地10个县1939年至1945年区委书记、区长任职变动情况做的粗略统计⑥,

① 数字不包括分级政权和群团干部。

② 《晋冀豫区各地各县工作汇报》(1941年5月),晋档,A01-01-044-138。

③ 《太行区党委第六次组织联席会议记录》(1945年2月),晋档,A01-02-008-001;又见《陈漫远同志关于晋绥历史问题的发言》,《罗贵波同志关于晋绥历史问题的发言》,《老总(指贺龙)在晋绥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7年7月)。

④ 县级以上政权、群团机构因精兵简政编制收缩情况不同。

⑤ 《太行区党委第六次组织联席会议记录》(1945年2月),晋档,A01-02-008-001。

⑥ 包括晋冀豫根据地平定县、磁县,晋绥根据地岚县、方山县,晋察冀根据地阜平县、曲阳县,冀鲁豫根据地滑县、内黄县,山东根据地博山县、郯城县。这些地方组织史、史志资料编撰大多比较粗疏,人名错讹较多,但选取7个年度的任职情况,还是可以大体反映出一些基本趋势。参见中共平定县委组织部、平定县党建研究会编《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平定县组织史资料》,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中共磁县县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磁县组织史资料(1925—1987)》,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山西省岚县组织史资料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岚县组织史资料(1935—1987)》,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方山县组织史资料》(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中共方山县县委组织部、县委党史办1988年编印;中共阜平县委组织部:《中国共产党河北省阜平县组织史资料(1925—1987)》,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曲阳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曲阳县组织史资料(1930—1987)》,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滑县县委:《中国共产党滑县组织史资料(1931.6—1987.10)》,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内黄县委:《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内黄县组织史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组织史资料(1926—1987)》(内部资料),中共博山区委组织部、中共博山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博山区档案馆1989年编印;《中国共产党山东省郯城县组织史资料(1927—1987)》(内部资料),中共郯城县组织部、中共郯城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郯城县档案馆1990年编印。

可以大致印证这样一个趋势。

在这个 10 个县人名可考的 1939 年时担任这两个职务的 122 名干部(筛去担任过多个区主要干部的重复任职者,这类人数量不少)到 1942 年还在区级岗位上的只有 19 人。而在 1942 年任这两个职务的 157 名干部到 1945 年时还在区级岗位的有 117 人。同时,如参照其他资料对这些干部的个人履迹进行追踪,前述 1939 年至 1942 年出现明显变动的 103 名干部中有 49 人可以大致确认他们在这三年间的经历,其中有 13 人升至县级干部,3 人调上级机关,5 人牺牲,2 人病故,5 人叛变,4 人降为村干部,其余 17 人遭洗刷或回家。由于能提升至县级以上职务或牺牲的干部姓名相对容易查找(部分改名者除外),所以,即便考虑到反“扫荡”中干部损失的因素,事迹不彰的干部中恐怕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是以沉降为归宿。

如果对 1942 年至 1945 年出现变动的 40 名干部中可大体确认经历的 23 名干部也做同样的追踪,则发现仅有 2 人升至县级序列,1 人调任专署,2 人平调县政府,5 人牺牲,1 人病故,4 人叛变,1 人降为村干部,7 人遭洗刷或回家。

由此,可以大致得出两个局部的判断:一是 1939—1942 年华北根据地的区级干部的人员构成其实发生极大变化(晋察冀根据地两个县明显比其他 8 个县变动要小一些),可能在整党审干及实际工作中有大量区级干部遭到洗刷,如晋绥根据地领导人郑林所言“整顿支部撤下很多成分不好的,区村干部换了整一茬”^①,而 1942—1945 年间,区级干部任职则相对稳定。二是 1939—1942 年的区级干部尽管遭遇洗刷的可能性虽大,但上升可能性方面却要明显大于 1942—1945 年这一时段的区级干部,那些任职时间较早且成分好的干部往往能在抗战相持阶段获得较快提升;于是乎,这个干部队伍可能总体呈现“不进则退”的极端趋势。

应该说,此一时期,对基层干部的成分问题,中共的政策执行其实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对“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坏成分”一般是采取阶段性组织洗刷的办法。对于这些成分不好的干部,其主要政治风险还是某个时段集中开展的组织整理活动,一旦能在整党审干中过关,成分问题似乎又会被搁置一段时间。但总的来看,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虚虚实实间仍是以抓实为主要导向,中共对基层干部成分问题的把控还是在波动中趋于紧缩,成分不好的干部的精神负累也趋于增重,与后来的历史轨迹终形成顺接关系。

那么,到底什么样成分的干部更容易获得升迁呢?这里以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曾长期驻扎的山西黎城县 1937 年底的 32 个主要干部作为一个群体例证(见表 4)。^②

表 4 黎城县 32 名干部个人信息及履历对照表

姓名	成分	出生/入党时间	文化程度	重要经历及 1937—1943 年前后升降状况
杨蕉圃	知识分子(父亲是地富家庭出身的医生)	1911 年/1937 年 11 月	大学毕业	黎城第一个党支部书记,抗战初为黎城县委宣传部部长,调区党委机关报社任编辑,1942 年任武安县委书记,后调回《新华日报》(太行版)任报社副社长、编辑部主任。
李时哉	知识分子(地主家庭)	不详/1937 年 11 月前后	中学	黎城县工委书记,后为县牺盟会特派员,因左倾被降职,后调干校工作,1943 年前后为太行干校一般干部。

① 《郑林同志关于晋绥历史问题的发言》(1947 年 7 月)。

② 参见佳地、平杰《康丕烈传》(非正式出版物),2011 年,第 48 页。



续表 4

姓名	成分	出生/入党时间	文化程度	重要经历及 1937—1943 年前后升降状况
史纪言	知识分子(富农、上党乡村师范校长)	1910 年/1937 年冬	大学毕业	曾参加过国民党,与托派张慕陶也有接触。抗战前未入党,抗战爆发后经杨蕉圃介绍入党。原为黎城牺盟会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因未经组织批准擅自行动被批,到上党牺盟会组织工作后一度赋闲,后改派去办报,先后任《黄河日报》《太岳日报》社长,1942 年调《新华日报》(太行版)报社任副总编兼秘书,随即升任总编。
霍泛	知识分子(中农)	1915 年/1936 年 7 月	中学毕业	黎城县牺盟会组织部部长,1938 年 9 月调区党委宣传部任秘书兼干事,后调回黎城县委任宣传部部长,1942—1943 年间任黎城县委书记。
李旭华	知识分子(地主)	1917 年/1937 年	大学	原为黎城牺盟会特派员,后调回老家武乡县任县教育科科长至抗战结束。
郑易风	知识分子(地主、教师)	1912 年/1937 年	中师	父亲为当地著名乡绅,八路军工作团到黎城后住郑易风家。担任游击队指导员,后继续担任游击队领导职务(整风后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任职,上升很快)。
郑立格	知识分子(地主、教师)	不详	高中	郑易风弟弟,在牺盟游击队中任连指导员,后转任县公安局局长,1942 年在反“扫荡”中牺牲。
李静波	知识分子(高小校长)	1910 年/1937 年	高中毕业	县公道团团长,初期为县工委宣传委员,后被作为统战对象对待,转去从事教育工作,长期未获升迁。
康森奇	知识分子(地主)	1906 年/1926 年	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报考军校,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抗战初任县政府武装科科长兼游击队副总队长,后在 1942 年减租减息运动中被免职。
康武歧(康丕烈)	知识分子(地主)	1917 年/1937 年	高中肄业	康森奇弟弟,抗战初为黎城牺盟游击队四中队指导员,屡屡遭遇贬斥。
张岷山	地主	1913 年/1937 年	高中	牺盟游击队中队指导员,在党内长期作为进步人士对待,后多年在县里担任政权方面区、科级职务。
高谨哉	知识分子(中农)	1916 年/1937 年 11 月	初中	长期在县政府内任职,历任多个科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董俊民	知识分子(中农)	1913 年/1937 年	太原国民师范毕业	县委副书记委员,后升任县组织部部长,后调区党委直属县辽县任组织部部长。
程守创	中农	1919 年/1937 年	高小毕业	曾在共产党员李一清领导的山西省国民军官教导第五团当兵,同年 7 月在平定整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返乡,被认为品行不佳,自行离开到决死队中工作。

续表4

姓名	成分	出生/入党时间	文化程度	重要经历及1937—1943年前后升降状况
董用芳	地主(县高小校长)	不详/1937年	不详(根据其身份应至少为中学以上学历)	抗战初任县委秘书、县委组织部部长,后被认为能力不足,逐渐下降,1942年在某小学任副校长。
董寿松	下中农	不详/1937年	不详	开始在县基干队工作,后升任县农救会、武委会负责人,被评为“劳动英雄”,后升至地区武委会副主任。
董海忠	贫农	不详/1937年底	不详	初期作为群运领袖在县里当干部,后回家。
董立法	地主或富农	不详/1937年	中等师范	抗战初为黎城县漳河游击队指导员,扩编后为著名的“梅花繁支队”指导员,后编入八路军,审干后下降。
董效良	贫农	不详/1937年	不详	抗战初为漳河游击队中队长,1942年后任区长、区小队队长。
董宜正	贫农	不详/1937年	不详	抗战初在牺盟会、农救会等处任职,后回家。
李亮鉴 (李世铭)	上中农	1907年/1937年11月	初中	抗战初为黎城县政府司法科科长,后调长治县,1942年前后任司法科科长。
孔广仁	地主	不详/1937年	不详	初期在漳河游击队中工作,后事迹不可考。孔广仁家住黎城县孔家蛟村,由于八路军曾驻扎于此,早期也有较多党员,但后来这些党员多事迹不彰。
康兰廷	贫农	不详	不详	黎城早期党员,后到豫北工作,只是一般干部。
申志贤	地富	1914年/1938年	不详	初在黎城县西井区分委工作,后被选派到晋冀豫区委党校学习,返回后任区委书记。
岳希云	地富	不详(年龄较大)/抗战前入党	不详	抗战前即担任地下党党支部书记,后因年龄问题未担任重要职务,1942年前后仍是村干部。
路文学	农民(具体不详)	不详	不详	抗战初为八路军工作团通讯员,群运中担任县农救会负责人,1942年时已脱队回家。
李友来	中农	不详	不详	抗战初最早一批党员,担任区委书记,整党中被开除回家,解放后曾在县木器厂担任厂长。
杨耕六	中农	不详	不详	杨蕉圃兄长,黎城早期党支部委员,后回家教书,在后来的反特务运动中被打死。
李尚文	知识分子(中农)	不详	上党乡村师范毕业	抗战初为牺盟游击队中队指导员,1942年后升任军分区敌工科科长。
刘寰	知识分子(大地主家庭)	1921年/1938年	中学	抗战初为牺盟会游击队中队指导员,但此后长期未得提拔。
李玉田	农民	1914年/不详	不详	初为区委宣传委员,升任区委书记,后回家。

续表 4

姓名	成分	出生/入党时间	文化程度	重要经历及 1937—1943 年前后升降状况
乔孟昭	知识分子(地主)	1908 年/1937 年、1941 年	中师毕业	初为牺盟会特派员, 原已入党, 1939 年因托派问题被撤销党籍, 作为进步人士看待, 后二次入党, 1942 年任某区副区长。

资料来源:《史纪言个人材料》,1946 年;佳地、平杰:《康丕烈传》,第 17—40、63—116 页;刘寰口述,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记录:《刘寰同志的历史回顾》(1990 年 6 月 25 日);牛泉影:《毕生心血铸精诚:老党员刘寰的风雨春秋》,高喜存主编:《阳泉党史人物传》第 3 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0—81 页;《乔孟昭个人材料》(1946 年);等。

直观此表,不难看出抗战初黎城县干部队伍的主体是一批抗战初入党的本地知识分子干部,虽多属边缘知识分子,却是黎城地方干部队伍的主体,工农干部比例很小。据其他史料参证,这 32 名干部中,杨蕉圃、杨耕六、郑易风、郑立格,康森奇、康丕烈是三对兄弟^①,杨蕉圃、史纪言二人是至交好友,郑立格、刘寰、康丕烈则是杨耕六学生;同时,董用芳等七人皆是西井村或邻近村同族近亲,董用芳是当地小学校长,霍泛是其学生,乔盟昭是他的表弟。^② 这样一来,这 32 个干部中有明显的两个圈子:一是杨氏兄弟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均出身当地具有名望的地主家庭,刘寰家则是黎城首富,杨蕉圃、史纪言还是晋东南有名的诗人;二是董用芳为中心的董氏亲朋,他们的成分则比较丰富。

在这些干部中,杨蕉圃、史纪言均是抗战初中共在黎城落地的关键人物,他们在政治上发展比较平顺,到 1942 年时均已是地委级干部。杨、史二人均来自地富家庭,但成分问题总体上并未制约他们的的发展。以他二人之资历,已算上升迅速的干部。大体而言,在华北根据地开辟阶段,无论是外来者还是本地人,最早的一批干部多是满腔热血的青年干部,他们家庭出身各异,但多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根据地党组织往往对他们评价甚高,认为这批人“数量不大,但积极勇敢、意志坚定,是开荒的种子”。^③

除杨、史二人外,上升相对较快的有霍泛、董俊民、董寿松、董效良、李尚文五人,这五个人中,除董寿松是下中农外,其余均是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那些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干部则更容易受到政治上的挫折;而中途回家脱离革命者则多是中农、贫农出身的干部。如此看来,工农出身的干部总体上上升空间较小,故他们在基层往往较早遇到瓶颈;但部分工农干部的优秀分子一旦走上一定层次的领导岗位,则可能因出身优势而更容易获得上升机会,甚至成为典型被各级领导班子结合进去。如前节提及的山西昔阳县干部马兴元虽具有较强工作能力,但最初迅速被提拔为县级干部还是沾了贫雇农出身的光。^④

必须要说明的是,这种在成分问题上的暧昧主要还是针对中层及以上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抗战初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后,此阶段北方局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创造阶级干部”。^⑤ 这一方面是说仍要用知识分子干部,另一方面则要突出对知识分子干部的“改造”,他们希望“确定艰苦的教育政策,创造阶级的知识分子”。^⑥ 说到底,“知识分子”是个有关文化程度的说法,与依财产状况划

① 参见佳地、平杰《康丕烈传》,第 8—22 页。

② 《乔孟昭个人材料》(1946 年)。

③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 1940 年 6、7 月间),晋档, A01-01-068-001。

④ 《信念永恒:马兴元纪念集》,第 104—114 页。

⑤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 1940 年 6、7 月间),晋档, A01-01-068-001。

⑥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 1940 年 6、7 月间),晋档, A01-01-068-001。

分的各种成分不是对等之概念范畴。但在划成分时引入这个“参数”，成分划分其实成了一个双重标准，知识分子干部似乎与其家庭出身进行了组织层面的切割。在组织工作的实操层面看，中共在这一时期已经在干部鉴定表中开始分列干部的“出身”与“成分”。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党组织对某些中高级干部刻意修改、隐瞒成分的问题也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即有干部背后揭发杨蕉圃将自己的成分从地主改成小资产阶级就是听了地委组织部部长陶鲁笳的“指点”，而地委书记刘建勋则“故意纵容”。^① 根本上讲，在干部问题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虚”，其实是中共与自身干部实况的妥协。

当然，成分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身份属性问题，而与干部个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直接的纠葛。因此，中共的这种“虚”仍是有限度的。即便是级别较高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时，成分问题很容易被提出来。如史纪言原本已被内定出任区党委代理秘书长，但在1942年的反“扫荡”中被伪军俘获。据史自己回忆，开始在他劝说下有汉奸将他放了，却又被另一汉奸捆上，他绝望中趁乱跳崖寻死，结果滚下山去并未丧命，在重伤中遇老乡后获救。但归队后，组织上对史纪言并不放心，而认为史纪言“当时带着章、印、笔，汉奸是否能将他简单放了？”^②由此组织部门一位领导人提出：“史家是黎城有名的地主，建国军（当地伪军）团副是他亲戚”，另一干部又提出史纪言“一直有很错误的阶级观念，还有张慕陶托派嫌疑”。^③ 这样一来，现实问题无法释疑，阶级出身又引出历史尾巴，只能从事文宣工作而难获重用。

四、余论

面对前文诸多动态变化中外施或内生之考验，尽管有不少革命路上的殉难者、沉溺者、掉队者，但还是有相当数量之干部坚持下来。而由此形成之根据地干部大致格局，仍能反映出他们进退出处间点滴微妙。

因建立、巩固之具体机缘不同，抗战时华北各根据地的干部来源各有特点，但从人际网络层面仍有可贯通理解之处。如华北地区主要的五块根据地中，除山东根据地外^④，晋察冀、晋冀豫（后分太行、太岳）、晋绥、冀鲁豫的地方干部群体均主要由原平津、河北地下党干部主导，例如晋察冀之彭真、刘澜涛、林铁、胡锡奎等，晋冀豫之李雪峰、薄一波、安子文等，晋绥之林枫、赵林等，冀鲁豫之黄敬、张霖之等。既往论者常简单强调这些领导人与刘少奇之私人关系，其实这种理解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李雪峰、赵林、张霖之等人均与刘少奇并无多少渊源，李、赵二人都在1935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反对过刘少奇。此部分高级干部的最大交集在于他们基本全都是1934年后中共在白区力量恢复期里逐步崛起的党内新秀，在前期相对边缘的位置让他们与此前党内上层路线斗争抑或权力斗争牵涉较少，身上的历史包袱较轻；而北方地下党的经历也让他们在思想上受苏维埃时期“左”倾思维惯性影响相对较少，这让他们多可以轻装上阵适应革命之新形势，并形成较深之战斗情谊。各根据地领导层也有其他方面出身的重要领导人，但以上这批平津地下党出身的干部仍是华北根据地干部群体的根本核心，大多成为此后20年掌控河北、山西、河南、内蒙古等地权力要津的显赫人物。而华北根据地高层干部基本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群体组建起来的，形成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

① 《太行整风小广播》（1945年1月）。

② 《史纪言个人材料》（1946年）。

③ 《史纪言个人材料》（1946年）。

④ 所谓山东根据地本地干部领袖黎玉其实原本也是平津地下党干部出身，但与刘少奇关系相对疏远。

人际网络。不得不承认,到抗战相持阶段,一批与此群体关系较远的老资格的农运、工运领袖如李菁玉、何英才、张友清等人,政治地位均有明显沉降,前述这批干部在华北根据地已全面主政,各根据地后起的政治新星基本均是与此有深度关联的人物。这种人际网络的形成,从根本上体现着根据地核心干部团队走向稳定的趋势。

当然,对此格局的理解不能过于固化,到一般地委级干部和县级干部层面,特别是广大本地干部群体中,则有更多因素制约他们的政治沉浮。比如,这突出的体现在晋冀豫根据地县级干部的“产地”状况上。

根据笔者初步统计,在晋冀豫根据地,到1940年底,担任过县级党委和政权一级(县委组成员加县长)的本地干部共计271人。如选取他们在太行根据地范围内第一个任职地点作为参照指标,可发现有8个集中的干部“出产地”:河北省的磁县、赞皇县、邢台县,山西省的黎城县、沁源县、平定县、和顺县、阳泉工矿区。^①即由这些地方出来的干部更容易持续上升。

这一统计结果虽非动态,但由于原本太行山区内中共并无多少组织基础,担任县级职务者大多还是后来逐级甚或越级提拔起来的。而且,这一结果与晋冀豫区党委当时的总结情况是大致相符的。在1940年六七月间,晋冀豫区党委对此前生产干部多的地方做了如下概括:

- (1)工人多的地方,如磁县、阳泉出了不少干部;
- (2)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黎城、沁源等;
- (3)过去有过革命历史的,如磁县、赞皇。^②

继续分析这些相对“出干部”的地方的地域特征,其实还有其他地域因素:1. 和顺、平定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太行山区后最早的屯驻地,依托一二九师的晋冀豫省委最初也在这一带活动;2. 沁源、沁县是牺盟会大本营,大量牺盟会出身的干部来自这两个县;3. 黎城是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的长期驻地;4. 赞皇是在根据地初建期工作有突出业绩和出现根据地范围内所树先进典型的地区,如赞皇县的“红五月”被视为根据地组织大发展的典型。

与“多产”地区相对应,则有产量偏低的地区。从前面的统计中,并不能看出具体哪些县明显生产干部较少,因为在样本不大的情况下,大多县的统计数据差值很小。但我们还是能看出来,根据地边缘区、接敌区产生的干部较少。如晋绥之大青山地区、晋冀豫之豫北地区出来的干部就数量较少。而且,像发生过“邢仁甫叛变”“湖西肃托”等严重事件的地区,也常会有少出或者不出干部的后遗症。

应该说,“产地”的非均衡分布,其实仍很大程度上是人际网络对干部升降制约作用的延伸。

此外,不同任职系统也会给干部的升降带来影响。一般看来,当时地方干部的任职系统大体上有三个:一为党内,二为政权,三为群团。但这三个系统内干部的浮沉状况则差异不小。

有根据地领导人即指出:“前几年升官快的都是党的机关的干部,提拔时都重点考虑党口干部。”^③而根据地组织部门则很早就对此情况有专门总结:

^① 有些本地干部最初即是跨县任职,政治生涯后来与籍贯所在县关系不大。如平定县人池必卿即最早在和顺县担任组织部长,此后也未在老家平定县做过干部。因此在笔者看来,此指标比籍贯地更能反映干部出产地问题。

^②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1940年6、7月间),晋档,A01-01-068-001。

^③ 《晋绥分局会议记录》(1945年4月),晋档,A21-01-012-001。

党内干部一般说进步和生产是迅速的,干部们也是逐级提拔的,……一般也是随着工作的发展而发展。……(政权系统内)区级和县级常常是一年和两年以上的分子,职务和工作都没有大的变化,一般都在那个范围或安心或不安心地兜圈子,没有什么升迁,也没有什么增减。群众干部,一般进步是迟缓的,本来就不行,有时还长久停顿下来,正向着不正确的方向发展,如贪污、腐化、官僚化等,区县级的干部也都无大差别。^①

应该说,以上这段材料既体现了党组织对三个系统干部状况的总体评价,也说明了三个系统的干部的升迁现状与前景问题。举例来说,晋绥根据地兴县在1939年时担任区委书记的8名干部,到1942年时已有5人升任县级干部,1人已调其他县任县委书记;同期担任区长的10名政权干部则只有1人进入县级干部序列。^②

而一位河北干部的牢骚也印证了这一点:

三九年我被选举为县农会副主席后,组织上想让我去做县委秘书,我不愿意,一下子从主席变文书了,但后来发现在县委工作的同志进步快,大家都清楚了。我没去县委工作,顶上我去的是青救会主席,没多久就升了宣传部长,后来调地委,干上宣传部副部长。^③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条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两个候补者均是群众团体干部,而非政权干部。这是因为在当时,群众团体和党组织关系相对紧密,因为群众运动多是由党组织负责组织,群众团体干部除了部分群众斗争中涌现的领袖,多是受过党组织培训或未受训被党组织直接派去的。

回到主题上来,我们不得不思考造成不同系统浮沉状况的原因。初步看来,笔者认为大致有三个原因:

第一,党组织是中共地方党政组织中的核心力量,地位高于政权和群团组织,受到上级重视较多,提拔时也是首先考虑的对象。如某地区几个县级岗位(包括政权、群团组织岗位)出缺时,地委即让平西县委首先从区委书记中选择两名优秀者推荐给地委组织部。

第二,党务机构当时比行政、群团组织的人员要少很多,队伍比较精干,随着组织扩张纵向提拔机会更多。在根据地建立初期,地方党组织很多还处于半地下状态,即对外常常有掩护名义。如初期常用“八路军工作团”名义开展活动,有时也会隐藏于政权机构中某个部门之中,有时还会对外挂出地方报社的牌子,因此干部数量也保持比较精干的状态,常常除了书记和组、宣二部长(委员)外,只有两三个干部。而各地抗日政府内,因行政工作任务繁重,新旧人员混杂,一般科室多、干部多。

第三,因最初机构定位不同,党务机构干部在配备时往往更重视出身、成分的阶级纯洁性标准,而政权干部群体的成分往往并不太符合此标准,许多抗日政府县长、科长最初也是作为社会名流、地方俊彦而被推举出来的,即使本人是中共党员,也往往出身官僚、地富、商人等家庭。而群众团体的干部虽文化程度甚低,成分却不一定好,往往有流氓分子混入。如前所述,随着中共在基层干部提拔任用上对阶级纯化强调渐多,党务干部自然优势越来越大。

①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1940年6、7月间),晋档,A01-01-068-001。

② 中共山西省兴县县委组织部、兴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兴县档案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兴县组织史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0页。

③ 《太行党校整风第四期学员对各级领导的意见(二)》(1944年)。

不过,有时候干部的选择动因并不全部指向所谓的“升迁”,而有其他种种考虑。比如,在抗战初期,政权组织往往掌管着地区内的财粮大权,政权干部有工资而党务干部没有收入来源,而且公开工作也让人更容易过“官瘾”。有时候普通党员干部更愿意去政权系统任职,而非更容易升迁的党务机构。^①

必须承认的是,在此时期内,其实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干部进退升降,例如疾病、心理状况、道德行止、贪腐问题等等,篇幅所限,不再具体讨论。但揆诸前述种种史迹,笔者大体有四点看法:

第一,对华北根据地干部而言,抗战相持阶段是一个形势转变期,由严峻形势带来的重大干部损失问题是导致此时期干部队伍变动、重组的一个原发性动因。干部损失造成的编制空缺原本可顺理成章地以大规模培养、提拔干部方式解决,但中共为渡过时艰而推行的“精兵简政”却在政策层面对华北根据地党组织形成约束。抗战相持阶段华北根据地干部队伍的结构性矛盾正基于此,后文干部进退升降问题上的扭结点也发端于此。

第二,忠诚度与能力的平衡问题是历史上政治势力在选人用人上都要面对的难题。在政治的日常中,中共更强调干部的能力,这是在此困难期选用干部的常规标准。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忠诚度对于干部升降沉浮仍是根本之前提,堪称“一剑封喉”。此一时期,在华北根据地普遍开展的审干是对干部忠诚度的集中考核,对中层以上干部的进退升降有极大影响。审干既有理清组织关系、建立严格干部档案制度的好处,也有过于严苛、激进之偏误。由此过程析出的一批“问题干部”在未来的政治生涯将长期面对沉重组织压力。而中共的优长在于把干部忠诚度与能力常常出现的现实落差,以意识形态的理论语言进行修饰、拔高,根据需要给予轻重间的取舍。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在于给当事干部及旁观者以极强的政治说服力,这恰恰对强固干部对组织的忠诚度大有裨益,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艺术性。

第三,在笔者看来,中共对成分问题的处理有与干部状况现实妥协的一面,但在摇摆状态里对干部的阶级成分的强调仍呈现波动趋强的大体取向。对华北各根据地基层干部而言,以成分作为关键考察点的整党,对他们的进退升降产生极大影响。受波及干部的比例其实相当之高。我们还是必须意识到,中共在中层及以上总体上仍是个“知识分子党”,作为中坚力量的中层以上知识分子干部,其政治前途较少受到成分影响。中共把文化程度引入到成分划分的标准序列中,将出身与成分逐渐分列,无疑是极富智慧的。当然这并非中共独创,也有效法苏共的成分。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成分问题上的淡化,即便是面对中层以上干部,也有“先来后到”的区分,对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之后尚未进入县级以上干部群体的成分不好的知识分子干部,提拔的谨慎度已大为提高,此类人群觅得下一个晋升机会期还须静心等待。

第四,本文并未重点讨论华北根据地干部群体在进退升降过程中的人际因素。从大范围的群体角度来考察时,人际因素等因素往往是与前述一些因素叠加方能真正广泛影响干部群体的进退升降,中国共产党对“亲缘政治”“裙带关系”的抑制还是富有成效的。但需要承认的是,人际因素对干部个体或者局部的小圈子的政治浮沉而言,有时确实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于是,即便是中共这样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党,只要不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其实各种因素很难说哪一种就一定能对干部进退升降产生一锤定音之影响,总有灵活处理、折中变通的操作空间。

[作者赵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应为1940年6、7月间),晋档,A01-01-068-001。